

近年来红军长征研究述评

作者：王继凯 文章来源：中国军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

近年来红军长征研究述评

中央党史研究室 王继凯

[摘要] 近年来，红军长征史的研究呈现多样化深入、互动中前进的活跃局面。本文概述了研究成果和特点，评析了关于红军长征的原因、出发地、会师地、里程、重要会议、领导层变迁、研究方法，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和推进研究深入发展的途径。

[关键词] 红军长征；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外对红军长征史的研究呈现多样化深入、互动中前进的问题上取得重要新成果，也反映出研究中存在的学术难题和不足之处。

一、主要研究成果及特点

近年来，大陆学术界出版和发表了大批有价值的长征史研究专著、文档资料。出版的代表性专著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通史著作，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著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史》、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色铁流——红军长征全录》等；二是专题研究著作，如石仲泉的《长征行》、杨炳章的《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等；三是重要专题研究著作，如陈宇的《谁最早口述长征》、徐占权的《解读长征》等。著各有特色，百花齐放。

整理编辑的有关文档资料主要包括：一是出版了一批回忆录、长征日记等，如《红军长征亲历记》、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红军长征记——亲历者说》、《杨尚昆回忆录·红军岁月》、《赖传珠日记》等。二是将大事记、回忆录和历史档案等资料汇编成《长征档案》。三是部分报刊如《党的文献》、《百年潮》、《解放军报》等，转载了一些回忆长征的文章。

再则，学者们发表了不少有重要价值的论文，或对重要热点问题提出新的见解，或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综观上述成果，这一时期大陆的长征史研究具有如下特点：1、长征通史研究取得突破。军事科学院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史》是以各路红军的征战历程为基本框架，系统推出了新的研究成果；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红色铁流——红军长征全录》以红军长征为主线，搜集了不少新材料；有些通史著作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开辟了学术新路。2、专题研究取得突破。除了上述一些相关研究论文外，陈宇还推出了专著《谁最早口述长征》，对20世纪30年代长征的起因、版本、内容、特点、价值进行了详尽的解析评注，是专门研究长征文献的力作。如关于长征的出发地、会师地、长征里程、“密电”事件、遵义会议、中革军委的成立等，都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推动了学术研究的进展。4、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和模式。如杨炳章的《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将长征史研究与革命理想主义相结合，创新了研究范式，取得突破性成果。比如，杨炳章用“革命理想主义”来解释中国共产党在地域上和战略上的关键性转变，构架了一套独特的研究体系和方法。5、研究视角和方法多样化。新世纪以来的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2004至2006年间。党史研究这种集中于特定领域，有利有弊。一方面，它可以集中整合各种力量推动党史研究迈上一个新台阶；另一方面，也存在急功近利和非持续性的问题。

近年来，台港澳地区出版的著述仅在中共党史及其他个别专题中论及长征。如高华《革命七十年》（台湾）、凌锋的《中共风雨八十年》（台湾）、高华的《红太阳的来龙去脉》（香港）等。但其往往表现出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如高华《革命七十年》的思想、实践及其对长征过程的矛盾运动的影响，有其独到之处。国外学者也从一定侧面上涉及长征，主要有：俄罗斯与德国学术机构合作编辑的《联共（布）党史（1919—1937）》，其中选编了一些与长征有关的共产国际档案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日本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政治史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危机与再生》，从一个侧面考察了党的生死考验和重获发展的双重意义；其他如英国学者Gray, Jack: *Rebellion*

rom the 1800s to 2000 (《起义与革命:1800至2000年间的中国》)等,部分30年代的发展。总体而言,近年来台港澳及国外学者由于资料缺乏、史观偏远不如大陆学者如此广泛深入,但其某些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可以借鉴。

二、重要热点问题及研究方法评析

1、关于红军长征的原因

过去长期以来的主要观点是: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严重危害造红军被迫长征。现在学者们从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因素等各个侧面,对这炫认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首先是由于这时的国民党政府内外经逐渐实现对中心区域的控制,红军及根据地继续在国民党政权中心区域附近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共双方力量在多种因素制约下形成的此长彼消局面,情况下,长征进行战略大转移,可以说是中共寻求继续生存、发展的必然之举。国南方和北方的社会、政治、文化各方面力量存在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其必然经败后,“华南不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无法在这样短促的时间里做好再次社会在一个世纪里没有被触动过,保留了一种高度的政治潜能。因而,20世纪难以在南方立足,长征是共产主义运动从南方到北方的一个必要的总体转移。原因的认识,其共同特点是强调战略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应该说,他们的分析度,但也由此带来一个问题:应该如何认识毛泽东的红色政权理论及农村包围客观必然性的矛盾?这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2、关于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

对此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是瑞金;一种认为是于都;一种认为是有化、长汀等。分歧的焦点在于对长征出发标志的不同认识。刘良认为,必须区地域三个不同的概念,1934年10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的第五号命令是中央红军一、第二纵队的长征出发地是瑞金;各军团撤离战场开始出发的地点分别是兴经的第二个集结地。黄鹏生从军事出征的共性特征,即集中与出发相统一、整相一致、以队伍集中后开始行动为出发标志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证了中央红军间是1934年10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各部队在雩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这里出现两个“开始”,清。

笔者认为,确定长征开始出发的时间、地点的关键是要弄清“长征”的概念,一,长征的根本性质是战略转移,其最早开始的时间、地点应为战略转移计划二,长征作为一个事件时,是一个整体概念,要把作为整体概念的长征和各部虽然中央红军各部队长征出发的具体时间、地点不同,但这些逐步、分别实施义,可以在某些历史叙述需要时,作具体说明。其三,“开始长征”本身是一个程与整体开始的标志区别开来。具体实施过程中的“各部队分别出发一到预定地属于整体的战略转移计划的,在这一系列“开始”中,只能以中央最早开始实始的显著标志。据此可以确定,整体而言,长征应为1934年10月10日从瑞金出有自己具体的出发时间、地点,于都应为红军长征的集结出发地。

3、关于红军三军大会师的地点

原来学术界比较认同的观点是:1936年10月9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在甘肃红二方面军在甘肃隆德县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县)会师。这两次会师联系一;近年来,宁夏党史研究室的邢万莹等提出了三军会师同心城的观点,其主要理都是两个方面军的会师,不能叫“三军”会师。而1936年11月初,准备进行山城到同心地区,并于12日在同心城召开了万人军民联欢大会,三个方面军的100多此,一些老同志回忆说“三军会聚同心城”。所以同心会师是真正的三军大会师,整、更全面、更具体、档次更高,也最合情理。对于此说,石仲泉认为可以讨问题:一是有无原始文献依据;二是会师的标准是什么,如何正确看待会宁会

笔者认为,“三军大会师”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一方面,它在历史上是渊源是会宁会师的第二日,即1936年10月10日发布的《中央为庆祝红一、二、文献说明,中共中央所讲的“三军大会师”,主要是从政治上来定位的,而触,所以中央在三军部队还没有完全走到一起时,就强调了“三军”在甘肃境内的史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具有重大政治意义:一是最终战胜了张国焘分裂主义

增强了革命力量；二是最终挫败了国民党将红军分割围歼的企图，宣告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阶段，对抗战和全国国内政治关系，是将向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证明红军是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的好朋友。见，如果单纯从具体地点上理解三军大会师，就没有抓住其在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三军大会师”又是一个政治意义和具体地点相结合的概念。”三军”在甘肃会宁和将台堡，三军大会师也就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会宁会师和将台堡会师。1天，即1936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说：“三个方面军已完全会合，会师问题已经解决，红军要执行新的任务了。上述分析说明，把会宁和将台堡会师有实质上的政治意义，符合其特定的历史涵义。至于20天后的”三军会聚同心城、城堡战役，以粉碎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对红军”追剿”，是部队转移部署的结果。参加，但主要是形式意义上的会师。

4、关于红军长征里程

英国的两位青年于2002年至2003年重走长征路之后，向媒体发表谈话说：10000到13000里；如果说25000里，也许就得把当年红军其他方面军所走的路程大波，世界各地的报道有100篇之多。

澄清长征里程问题具有重要历史和现实意义，不少学者及有关研究机构关注。是，通常所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不是各路红军都走了两万五千里，而是指红一方面军所走的里程。中央党史研究室李海文撰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证了红一方面军只多不少：第一，作者依据红军1937年统计的原始资料，将当年红一军团直属青年所走长征路线经过的地点和里程进行逐一对比，发现由于行走路线有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同等原因，英国人所走的长征路远比当年红军走得容易、的路程。第二，”二万五千里”的里程来历是：1937年统计的红一军团直属队的天数；当年毛泽东的算法是从1934年10月出发到1935年10月结束，以每天走70里。这里之所以不扣除途中休息的天数，因为中央机关所走的路最少，作战部队三，张爱萍之女张小艾在中国军事科学院和地方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的直接指三军团的长征路，其汽车里程表显示为23000公里，又有步行2000里，共48000里。这还没有完全走完当年红军所走的路线，所以即使扣除找路重复走的里数，也

关于其他红军长征的里程，一般认为，按各路红军所走最远的路程计算，红四方面军长征一万余里，红二十五军长征近万里。各路红军长征的总里程为六。这些数字，包括红一方面军长征的”二万五千里”，都只是推算和略计的约数。力量，似难以研究清楚各路红军长征的精确里程。所以，学术界应和有关测绘题，这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5、关于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一直是长征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近年来的典型成果如下。

第一，关于遵义会议是否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中共中央1945《决议》和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明确肯定遵义：中央的领导地位。学术界对此问题的探索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20世：的观点。90年代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也有学者提出，遵义会议开始确：东还不是领导核心，毛泽东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流观点重新确定：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或：央的领导”。上述学术演进过程的实质和焦点是在两个方面对党的决议的观点：具体职务和实际领导作用的关系上，是否可以确定”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东与其他领导人的关系上，是否可以确定”毛泽东是党中央的领导核心”的结论：题上，必须弄清的两个层次的实质问题。

笔者以为，解决第一层次问题的关键是要弄清”领导”和”领导地位”的含义。是带领、引导，二是处于带领、引导地位的人或职务。”领导地位”显然应指抽：用，而不一定必须担任特定的领导职务，这也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个特有现象。：组织形式上没有担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但他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已被当时的领导层所接受，他的威信和影响力大大超过了：以，”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的说法没有问题。有些学者在探讨这：它混同于”毛泽东是否党和军队的核心领导（者）或最高领导（者）”，这实际：

解决第二层次的问题，需要作具体分析。一般认为，从1935年遵义会议直：

名义上负总责的是张闻天，实际上起决策作用的是毛泽东。六中全会之后，张的工作移交给毛泽东。从1939年初起，张闻天实际上已不再在党内负总责。1942年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至此，不仅在实质上、而且在形式上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因而，从实质上看，可以说从遵义会议开始毛泽东已经是党的领导核心，其领导地位不是完全巩固的，此后先经打鼓新场风波，再经四渡赤水之战。即使就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地位而言，其正确思想被全党全军完全领会也需经历一定过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在同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的继续斗争中，逐渐符合历史自身发展的逻辑，历史本身是一个渐进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此情况下，我们只能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以确定这一问题的质。

第二，关于遵义会议与会者的身份。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认识当时共产党领导层的演变，并进一步探讨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学术界对此主要存在两点分歧：一是与会者身份还没完全弄清；二是对与会人员的分类有不同观点。中央党史研究室认为，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王稼祥是候补委员，并把与会人员分为出席（包括政治局委员、11名高级干部负责人、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18人）和列席（李德、伍修权）两类。但是，杨炳章认为应把除了服务人员、警卫人员、伍修权和邓小平之外的18名党和军队高级干部都列为出席者，当时不是主要领导人，只负责会议记录，伍修权是翻译，他们都是会议工作人员。与会者分为三个层次：会议主体即正式出席者——所有政治局成员；扩大参加者——各部队军事顾问；会议工作人员——记录、翻译。他还对与会者的身份进行了深入考证，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会议结束后，又增加毛泽东；朱德是否政治局委员，王稼祥应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石仲泉从王稼祥当时的各种表现——出面提议召开遵义会议，舆论要将博古、李德“轰下台”；在张闻天代表毛泽东和他发言之后还抢先发言——看，不像只是个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角色，而应为政治局委员。对此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外，还从参加遵义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人数，提出了遵义会议的合法性问题以及张闻天地位问题。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问题，大陆学术界不能回避，而应本着学术与政治、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原则，以认真考证和科学阐释。

6、关于长征时期的中共领导层和人物研究

长征中党和红军领导层的演变是一个重要课题，主要研究领域大致有两个：一是领导集团的具体研究。孙果达考析了红军长征中新“三人团”的成立问题，对通行多年的“博古、李德、王稼祥”三人团说提出质疑，认为新“三人团”成立的直接背景不是打鼓新场风波，而是鲁班场战役失利，红军成立时间是1935年3月17日，地点是在赤水河畔川黔交界处的陈福村。作者还进一步探讨了长征后红军的指导方针、指挥方式、作战方式和行动特征发生的显著改变及其影响。二是领导层和红军中清除李德错误军事路线的惯性影响，确立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地位的问题。杨炳章考察了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内部权力关系的变化，认为毛泽东在中共领导层从革命理想主义到政治现实主义转变过程中的每一步、每一阶段都起着关键作用。上述研究的实质都是要探讨中国革命由谁领导、怎样领导、向何处发展的问题，并以长征的全局为参照系来考察具体问题，把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

学者们还论述了中共重要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陈云等在长征中的重大贡献，丰富了长征研究的内容，但大多是总结性陈述，深入分析的少。对个人的历史贡献，应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具体分析，一要分清历史阶段，二要实事求是，论不符合唯物主义。

7、关于张国焘的“密电”事件

这一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成为研究的热点，近年来学界又有一定争论。1981年9月9日给陈昌浩发出了密电，主要意图是要部队南下、否则武力解决中央，但多数人认为历史上根本没有这一“密电”。石仲泉对此提出了三点比较中肯的意见：第一，是毋庸置疑的历史。档案查不到不能说明没有。第二，关键是“密电”的内容，要有确凿的根据，重大党史问题一定要有文字根据。第三，对“密电”问题不宜炒作。张国焘分裂中央，搞分裂主义，“密电”只是南下路线的一个具体情节，党史研究不能只顾猜疑。如果没有直接档案材料，这一问题还没有完全弄清，对这一事件的表述要科学严谨。

8、关于红军长征的重大意义

近年来，出现了进一步挖掘长征意义的新成果。

杨炳章指出：对于长征，不论从政治上讲，还是从历史地看，怎样强调它的意义都不为过。它像长城代表着中国古代文明一样，长征已成为中共革命历史的象征。他着重分析了长征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最初28年的历史是一个从马克思主义到

过程的话，那么长征则是这一转变过程中最明显的里程碑。正是这一转变为中国力量，这种力量与当时的外部因素相结合，导致共产党人在20世纪40年代末取得治思想史角度研究长征意义，是一个创新。作者在其中运用的西学概念和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但又有根本不同，比如“政治现实主义”概念偏重于强制性，更类似于政治实用主义。

还有学者从政治文化学视角提出了“长征文化”的概念及其重要意义：长征文献或文本，长期以来人们对长征的历史叙事、学术研究以及宣传、纪念活动等化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合法性依据和历史依据，提供源，对长征文化遗产的继承意味着对政权合法性的继承。此类跨学科研究方向

三、研究中的不足之处与今后努力方向

以上分析表明，近年来红军长征史研究成果显著，但仍存在诸多薄弱和未入挖掘。

在研究内容上需要重视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要加强对长征中重要会议的研究。目前学术界主要集中于对遵义会议的研究则很不够。红军长征中究竟召开了多少会议？每次会议的背景、时间、地点、内容、意义、影响、评价等，如何正确评价每个会议的地位、影响和相互关系？它们有哪些历史经验和启示？

第二，要加强红军长征中的文化、党建和政治工作研究。学术界长期以来只注重军事斗争，而对党和红军的文化、党建和政治工作的研究，仅有初步探索。这些有何显著特点和创新发展？对中国的政治发展、文化发展、民族精神、党的建设等问题研究清楚，长征的历史叙述仍然是不完整的，也不能深刻地说明其他问题。

第三，要加强对长征的分阶段研究。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曾经注意到对着眼于对具体问题的分析；石仲泉初步把长征进程分为四个或五个阶段。至今为止的阶段划分为基础的系统研究的成果。对长征进程的阶段划分，涉及到对长征